

# 道德、人權與中國問題

顧貝克  
林碧炤 著  
譯

顧貝克博士 (Dr. Anthony Kubek) 現任美國阿拉巴馬州哲義大學 (Troy State University) 政治學教授，曾於本年三月間訪華並在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發表專題演講，就卡特總統所倡導之人權外交與道德原則，加以分析評估，講詞經其返美整理後寄交中心發表，茲特為譯載，俾供讀者參考——編者。

今天，美國的外交政策，由於人權和國際道德的倡導，出現了一線曙光；美國人民也從政府的反覆聲明中，開始見到了這道隱微現的光芒。在此地，我將提醒諸位，這的確是令人興奮的轉捩點。在不久的將來，這個世界最老、最大和最強的民主國家的國民，將能與許多重要的國際問題，發生親密的關係。

這種情形的發生，現在正是時候。多少年來，美國人民無法明瞭世界問題的本質。美國在中南半島所遭遇的挫折，使美國人民面對敵人的宣傳，反戰示威和舉棋不定的政策，如墮五里霧中。和解政策的夢想，則使問題更為惡化。因此，在過去十年中，美國人民對於外交政策的看法，一直是模糊不清。不過現在，我們可以說，越南問題的創傷已愈，外交政策的迷惑已消。在一九七六年總統競選期中，某些外交問題曾經被提起，而且吸引大眾的注意（這或許應該歸功於雷根。不過，這件事不必再深述，我所要強調的是某些外交問題曾經熱烈的討論過）。現在，大選已過，美國有了一位總統，深懷基督虔誠，和美國開國的傳統精神，實是令人鼓舞。

今天，我對美國外交政策持有若干樂觀的看法，不久它可能會再度配合美國傳統的精神。當然，所有的預兆並非全是喜訊，而我們對新政府亦不能期望過高。當我參閱卡特總統在國家安全事務方面的重要顧問人員過去的論調時，亦難寄以熱望。這些顧問人員固然相當傑出，然而他們在越戰時期所發表的見解，在我看來，并無新奇之處。儘管如此，我依然殷切希望，卡特總統能效法華盛頓總統，執行外交政策，即是總統決定政策的綱領，他的副手照令行事。我同時祈望，卡特總統對於人權和國際道德所表示的關切，能使美國外交政策重回理想主義的大道，因為唯有此一大道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真正依歸。

在各位政治學者面前，且讓我以歷史學者的身份，對於二十世紀以來的美國外交政策，作一廣泛的說明。在此我不準備討論任何公開的文件，只是做一些簡要的概述，我相信大部份政治學和歷史學的專家們，都會同意我的看法。簡而言之，在本世紀之初，

美國的二位偉大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威爾遜（Woodrow Wilson），一為民主黨黨員，一為共和黨黨員，都曾為美國的外交關係，立下準則。他們全憑己見，少與內閣閣員或國會商討，大膽地制定了外交政策的原則。因為他們能預見世界局勢的可能動向，故能當機立斷，迅赴事功。

在本世界之初，世界的距離由於科技的進步，大為縮短。舊有的防禦觀念失去了重要性，而汽船、飛機以及電氣化的傳播和交通系統，縮短了時間，同時也使世界列強形成了短兵相接之局。羅斯福和威爾遜二位預見了這些變化的意義并以淵博歷史學家的身分，更深知這些變化對於美國疆域的影響。美國的疆界或美國自革命以來賴以成長的大西部，已經消失。早期的拓荒精神雖仍留存，但實質上的疆界已不復在。羅斯福和威爾遜了解到，二十世紀應該以全世界為活動範圍，美國不能孤處一方。無論如何，美國已處於世界舞台，而且擔任重要的角色。或許勇往直前的羅斯福總統要比充滿書卷氣的威爾遜總統，更喜歡這種情勢，但是此一差異并不重要。他們二者都認為美國需要如羅斯福總統所稱的一種「大政策」以作為美國人民在國際舞台上担任確切任務，和追求正確目標的大原則。

在極短時間內，這個大原則便已出現。羅斯福和威爾遜，二者皆是博聞好學，深具遠見，置美國外交政策於崇高的道德原則之上。以他們的見解，美國人民在二十世紀所扮演的角色是，保護和伸張全世界人類的自由。為了達到這個崇高理想，美國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原則被應用於外交事務之中。羅斯福和威爾遜並不認為美國的自由是完整無缺的，他們亦深知美國國內的不平等。但是，他們確信，只要美國立國先賢所遺下的原則不變，美國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將與日俱長，並獲得改善。目前，美國人民的自由，仍然有缺陷，但是我們總認為自由不斷地在修正之中，而且邁向完美之境界，因為美國革命所奮鬥的原則依然存在。

羅斯福和威爾遜二人對於美國人民的歷史，以及美國的前途與使命，均有高人一等的想法，遠比那些尸位素餐的政客、學者、專家和記者們更高出一籌。最近，美國學術界有人批評羅斯福和威爾遜為好戰者、盲信者和自命的救世主，同樣的，華盛頓和林肯亦遭到惡意的批評。然而，歷史終將證明是非，而那些惡意中傷羅斯福和威爾遜之士，亦將自取其辱。這二位總統，決非那些歪曲解釋所描述的人，他們亦不是為人所貶損的帝國主義者，更不是所謂人類的剝削者。事實上，他們是深具美國立國情操的理想主義者，亦是人類自由的推動者。他們的主要目的在於實現美國革命所揭示的大原則，基於此，他們已使國際道德和理想主義的原則，成爲了美國外交關係的指標。

事實一再證明，崇高的道德外交原則往往是困難的，而且面臨危險。對於任何時代來說，堅守美國獨立革命所立下的原則是件難事。保護和伸張自由不能片刻中斷，有時更是傷神費力與性命交關的工作。美國為了實現這個原則，曾經參與一九一七年和一九四一的世界大戰。當時美國之所以介入，純粹是爲了保護自由和實現人道精神，決非是爲了保衛殖民地，或者是民族優越感的作祟。美國人直覺地認為，如果他們是生來自由，則別的民族，如英國人、法國人和中國人，也應該如此。美國的士兵在戰場上贏得了

勝利；不幸的是，外交官員在會議上卻表現失色。使一九一九年和一九四五年戰後的談判，再度回到那爲人所熟知的現實道路之上。

從一九四五年以來，美國在處理外交事務之時，經常從崇高的道德原則，轉入現實的考慮。在韓國和中南半島的例子裏，美國首先高唱道德原則，最後迷失於現實的道路，造成了悲慘的後果。在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國和五十年代的古巴，美國自始便步入歧途，其結果是無價的自由在中國和古巴喪失了。

無數的學者、政客和評論家一再強調，美國並沒有失去中國和古巴，因爲這二者並不屬於美國，何來失去之事？這種說法實是荒謬之至！在中國和古巴所喪失的不是主權，而是人類的自由，這一點我們依常識判斷便可知，並不需要一位政治學博士來推敲一番。美國人深知自由必須保衛和伸張，全世界的人類，波蘭人、捷克人、古巴人和中國人，都應享有和美國人一樣的自由。

美國人民亦確信人權是全球性的問題。雖然我們推崇沙可洛夫和索忍尼辛的超人勇氣，人權並不限於幾位知識份子和反對人士。究實而言，人權實是包含正義外交的最高原則。這項原則遠及於越南、高棉，甚至於西藏和新疆等地的農民，就如同它被適用於美國十三州初期的百姓，如屠夫、麵包師、製燭師，具有相同的意義。去年美國渡過了獨立兩百年週年紀念，他們更深深體會到獨立戰爭是爲全民幸福而戰，決不是只爲華盛頓、佛蘭克林、傑弗遜等少數人而戰，獨立戰爭更是這些開國先賢爲美國人民以其將來的子子孫孫而爭。即使美國的一些政界人物不能表現這些爭自由的本意，美國人民卻深深了解革命戰爭所代表的內涵。

我個人希望卡特總統將反應美國人民的本性，因爲他是一位深具美國性格的總統，與威爾遜及羅斯福二人極爲相似。卡特總統的某些顧問可能認爲美國不必理會世界其他地區如高棉等國的人權問題，但是我相信，他可能會予以強烈的反對；同時，有些專家們也可能認爲人權問題將干涉到主權國家的內政，我想卡特總統對於此種看法，可能會置之不理。他很可能效法威爾遜和羅斯福，堅持自己的立場。我的預測不能說是絕對正確，但是以一位社會科學家的立場來看，我有股預感，覺得卡特總統擁有特殊的情操和勇氣來擔當美國的總統。

由於卡特在過去毫無外交事務的經驗，他勢必聽取專家、學者和國會中民主黨員的意見。他亦將從各方面諮詢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些可能是壞的。不過，卡特總統很可能成爲南方的個人主義者，深懷拓荒精神和熟知聖經，堅持己見，決不盲從。在過去兩個月，卡特總統曾爲伸張人權，大聲疾呼，至於他是否表裏如一，言行一致，將來的一、二年將有證明。

假若卡特總統言行一致，積極地推廣人權，他將發現美國人民是他堅強的後盾。他們對於美國政府在越南放棄崇高道德原則所引起的空前悲劇，將長遠牢記。但是他們在政府的正確領導下，決不會從保衛自由之戰中畏縮退卻。因爲自由是美國人與生俱來的觀念，亦是他們所珍惜的東西，更即是美國之所以被稱爲自由之士、勇者之國的道理。

且讓我們激昂地高呼道德原則，高唱人權主張。如今世界上，自由一再沉沒，現實主義和犬儒主義充塞美國的外交政策。在一

九七五年，當季辛吉被問到有關於索忍尼辛人權的呼號時，他却以譏諷的口吻反問：「索忍尼辛所要求的是什麼？難道他要核子戰爭嗎？」對於這種巧言，美國人民不能回以笑聲。如今我們只要回顧亞洲的殘破和非洲的混亂，便能發現多少自由已被犧牲或正流失，就像美國南方人所說的「已落進了無底深淵」，對於季辛吉的嘲弄，我們應該回覆說：索忍尼辛要求心理戰爭，我們亦有同感。在自由和共產世界之間，武力的不平衡是很明顯的。共產國家擁有正規武器和陰謀詭計，自由國家卻只依賴前者。共產國家持有利劍和毒菌，自由國家只有利劍。即使雙方同意裁減武器，蘇俄、中共、古巴和越南仍然有許多陰謀詭計，足以破壞人類所享有的自由。這種差異正足以推翻和解除的論調。

記得我在喬治城大學的恩師，沃希神父(Edmund J. Walsh)，一直是以「完整的權力」這個觀念來講述地緣政治學。他深自體會到心戰的武器在「整體戰」中對抗極權主義的需要。目前自由世界所迫切需要的，即是有效地心戰武器來對抗共產陰謀。蘇俄的愛國之士索忍尼辛和美國總統已經使出最有效的心戰武器——人權問題，來對抗共產主義的宣傳。

人權的伸張的確令人振奮，我亦讚揚美國總統在過去二個月的做法，同時希望這不是虛張聲勢。人權問題倘欲發生真正的影響力，必須在個別的情況下，接受考驗。在此過程之中，它勢必和另一重要問題——國際關係中的道德行為，連成一氣。這一事實已在二次大戰期間以及戰後的一連串國際糾紛中顯示出來，即外交政策中人權的伸張，必須配合威爾遜所倡導的道德觀念。我相信卡特總統，本能的便已了解此一事實，雖然他的某些顧問不見得如此洞悉一切。

當然，我個人決非有意向美國總統上一堂外交學的課。我只不過為在座的飽學之士，作一番專題的報告。在我看來，這些陳述在社會科學發展二十五年的今天，亦適逢其時。依我之見，卡特總統應當對於傳統道德已在美國外交事務中趨於渙散，表示嚴重關切。為了證明他本人對全世界人權問題的誠意，他同時亦必須重整美國外交政策的道德標準。很明顯的，人權問題如果不能配合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道德重整，將會變成空洞的和偽善的高調。去年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莫乃漢曾經表示，威爾遜的外交政策遠比季辛吉更為實際，關於這個說法，我表示同意。

為美國外交政策注下道德標準的猛劑，並不是新奇的事，它只不過重複美國幾位優異總統的傑出作法。威爾遜不是第一位，亦非最後一位。在我看來，目前這種情況，急須採取行動。自從越南和水門事件之後，美國人民的精神的確需要重新鼓舞，尤其美國總統更應聲明，放棄所謂「實在主義」，極端的現實主義和前任政府所熱衷的祕密外交手段。尼克森和福特的外交政策似可免於責難，因為它的目標是正確的，不過，它的大前提需要修正，因為它缺少美國傳統的理想主義原則。

綜而言之，全球性的保衛人權和採道德觀念為外交政策的指南，將使美國迅速回到羅斯福和威爾遜在本世紀初所創下的光明大道。這就像是海風，吹動全世界的自由精神。難道目前還有比自由更為美國人民和他們的友人所歡迎的東西？卡特以總統的職位，大可實現這個偉大目標。在其任期內，卡特總統任何作為都不能和此種成就相比擬。

在談完這些之後，我想簡要地說明有關美國的中國政策。如果今天我是在美國發表演說，我一定要對此一問題詳加敘述，但是在座各位都是專家，深知所謂中國問題的來龍去脈，重要關鍵以及它所代表的涵意，（我多麼希望美國總統能夠前來訪問，或者派遣國務卿，或其他人來此向各位領教）因此，我對一九五四年所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所包含的戰略重要性，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甚至於臺灣和中國大陸的社會和經濟差異，均可免去不談。同樣的，我對所謂外交關係正常化的問題，亦不擬多費口舌。簡單一句，這些全是毫無意義。在此我必須指出的是，所謂外交關係正常化的模式包括日本型式和德國型式，均不適合中國人和美國人，它們是外來的、現實的和虛浮的觀念。假若有人詢問我的意見，我將向美國總統推薦一種美國模式：也就是不犧牲友人以討好敵人。

依我個人看，中國問題正給于卡特總統向全世界表明其信念的無比良機，亦為卡特的意圖，提供最顯明的考驗。對美國人民和自由世界，卡特的中國政策正足以表示他對人權問題的真正立場。他對中國問題（此一問題現被視為美國外交的困境，但是它並未製造出任何原則上的難題）的立場和行動，將會對共產國家發生深遠的回響。他的中國政策對於北平、莫斯科、巴哈瓦那、平壤、和其他共黨的附庸的政策亦將有決定性的影響。總之，卡特對於中國問題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好是壞，都會在以後的幾年內反應於全球。

我們希望卡特總統明智抉擇而讓自由在全世界重振聲威並不為過，因為暴政之邪風，并非不可挽回。假若卡特採取正確的做法，世人不久便可重享自由，就像我在演講開頭時所說的，我個人抱着一極謹慎樂觀的看法。卡特是一位虔誠的宗教信仰者、南方的個人主義者、敏銳的思想家和機警的政治人物，我看不出有任何跡象，他會違反他的本性；也看不出有一個宣揚威爾遜人權信念的他，會出賣臺灣一千七百萬人民的自由；更看不出一位海軍出身的總統，就像前二位羅斯福總統一樣，會不顧太平洋或其他地區的可能危險，而降低防衛力量。這些事實所顯示出的真正意義就是：被奴役的人民，共產暴政下的犧牲者，正是自由世界的最佳盟友；而保證世界和平的最好方法就是讓馬克斯主義的共產政權，經濟崩潰，工業解體，被奴役的百姓起而抗暴。此一方法亦即是邁向全球和平與進步的唯一坦途。

此一方法首先可用在中國大陸。如同中國一句古話所說：「千里之行起於一步」，我個人對一九七七年的祈望是：卡特總統能追溯他純樸的本性，重置美國外交政策於道德觀念之上。（道德和道學式的觀念是不同的，美國總統以一位基督徒的立場，當能明辨此中差異）他對人權問題的主張將獲致最高的榮譽。北平政權的帝國主義邪惡勢力將被遏止，臺灣地區的自由中國人民的受到鼓舞，中國大陸的百姓亦將重獲希望。抗暴運動更將因此蔚成風氣。這就是我們的心戰武器，對付共產暴政的毒菌。自由的勝利，亦即所有的民族的最大自由，將是最終（縱或遙遠）的目標。這也就是美國開國先賢的基本觀念，也是羅斯福和威爾遜在這個動亂的世紀之初，所抱持的最具啟發性的理想。當這個世紀終了時，這個大理想可能比在一九七七年，更接近實現的目標。